



抗战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评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

周东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1 周年之际,《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约请 30 位学者笔谈如何进一步深化抗战史研究,大家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观点,其中,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问题。袁成毅教授的新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①(以下简称“袁著”)正可以视作寻求研究领域拓展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一、从传统军事史中寻找新视角:防空

抗日战争存在着侵略与反侵略的两个面相。仅就军事史而言,无论是研究的视角还是叙事的方式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日本侵华的角度切入,讲日军对华作战的决策、部署及作战的经过;二是从中国抗击日本军事侵略的角度切入,讲中国如何因应日本的军事行动,同样也涉及到决策、部署及作战的经过等。若将上述二者合一便构成了完整的“中日战争史”或“中日战史”,这无疑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抗日军事史的研究格外受到重视,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就中日空战史而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资料方面重要的有台湾“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编印《防空抗日战史》(台北,1953 年)、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编印《空军抗日战史纪要初编》(台北,1956 年)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则有刘维开的《空军与抗战》(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版)等。如果从日本对华实施空袭的角度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重庆等地学者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系列资料整理与研究。

但历史的研究从来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除了从双方“作战经过”来研究这场战争外,是否还有别样的视角?答案是肯定的。袁著从国民政府国防的角度切入别有新意。

国防是指一个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所采取的措施。国防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在漫长的王朝统治时期,最主要的国防形式是陆防,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者从海路的入侵才开始了江防和海防。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防的内容除了传统的陆防和江海防外,又多了一种新的形式——空防(或称“防空”)。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新的国防形式就在于当时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也才仅

^① 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仅 20 多年,这意味着对国民政府而言,空防是一个全新的国防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国民政府如何认识它、如何做出具体的防御部署,如何处理它与陆防和江海防的关系等等,都成了全新的课题。更为重要的是,空防对国民政府还是一个极具紧迫感和危机感的现实需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国民政府本身军事航空力量的薄弱,二是日本军事航空力量对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

中国有数千年陆防的经验,也有几十年海防的探索,唯对于空防则是前所未遇,因为空战是人类航空时代的产物,20 世纪初先是有了飞机,继则是有了利用飞机作战的实践,中国的航空起步虽然与日本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但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建立了不少航空工厂,而且日军还利用飞机执行过军事上的侦察任务。中国人对航空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也比较早,如第一位飞行实践者冯如很早就指出:“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①此后,孙中山甚至还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思想,他在 1924 年的一段话更是明确了防空在国家国防体系中的重要意义:“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之划分而言,往昔所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造地球成形以来之异象,就其效力言之,已打破兵舰、潜艇、战车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②尽管如此,从晚清政府最后几年才启动的中国航空发展速度太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 1928 年开始整合航空力量,但收效甚微,诚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我国航空,虽已创办有年,但因国家多难,军政未修,对于航空军备,迄无相当建设,即现有之空军,各省因受军事影响,大都各自为政,以言编制,相互歧异,以言系统,更形支离,因此不独对于补充训练感受困难,即调遣指挥,尤多滞碍。当此外患日亟,内忧踵起之时,空防尤属重要。”^③

袁著在简要回顾了世界范围内航空的兴起、飞行器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早期防空的基础上,特别梳理了从晚清最后几年艰难起步的中国航空以及到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航空水平,同时将日本军事航空的快速崛起作为分析问题的参照,得出中国可能面临来自日本巨大空中威胁的论断。这可视为作者对“国民政府对日防空”这一问题的“承题”与“破题”。

二、研究路径的新意:立足于防空体系的探究

“中国民众遭遇来自日本的早期空袭”是促成国民政府将防空作为国防重要内容的标志。袁著比较细致地考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对中国东北锦州等地的无差别轰炸和 1932 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对上海及周边苏州、杭州等地的空袭,并用较多的笔墨分析了日军在华航空作战产生的国际影响,特别指出“国际社会对日军航空作战中的无差别轰炸事件虽有所谴责,但强度有限,前后有别,不足以对日本形成制约。日本陆海军对华航空初战经历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发展军事航空的欲望”。^④也正因为此,提出了国民政府开展对日防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袁著以两章的篇幅考察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就日本对华侵略态势的研判以及构建对日防空体系的经过。其中“国民政府对日防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侧重于积极防空,“战前国民政府防空体系的逐步建立”侧重于消极防空。从积极防空角度看,袁著提出:“国民政府在 1932 年以后的 5 年左右时间里,基于这些防空计划,逐步扩大了航空兵力,新建了地面防空部队,初步形成了积

① 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 页。

② 谭雪锋:《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 页。

③ 李宏增:《中央航空行政设施与未来之发展计划》,《航空杂志》1929 年第 5 期,第 1 页。

④ 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第 29 页。

极防空的力量；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急需的航空人才”^①，此外还与美国等合作成立了飞机制造厂等，为全面抗战时期的积极防空奠定基础。从消极防空角度看，国民政府在中央成立专司防空的防空处（后称“防空委员会”），建立了防空学校，在各省成立了防空学会，在东南部分省份还成立了防护团，建立了防空监视哨和防空情报网。此外，还专门制订了南京防空计划，在南京等地实施了都市防空演习，举办了防空展览，开展了针对民众的防空启蒙教育，部分省市还开始了防空避难设施的建设。

国民政府战前建立的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体系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战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民政府的对日防空体系随着战局的演变也不断进行了调整。袁著用四章的篇幅，全面论述了战争的不同阶段国民政府采取的防空举措，其中“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空战与中国的防空”讨论了全面抗战初期中日军事部署与空战、日军对中国城乡各地的无差别轰炸和中国地面防空三大问题；“日军大规模‘政略轰炸’与中国防空的困境”讲述了日军在抗战相持阶段对中国各地的大规模“政略轰炸”（即主要以轰炸非军事目标来达致政治目的轰炸战略）和国民政府的艰难应对、国民政府防空体系的进一步调整（包括《防空法》细则的颁布、防空教育形式的变化和防空设施的增设）、空袭恐怖中的民众生活等内容；“战时中国各地的防空”对东南部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各省的防空业务逐一作了梳理。“中美互为战略支持及中国防空局面的改观”讲述了美国空军助战与中国境内制空权的逐步获得、日军空袭战略的再度转变与对华空袭的衰势，并特别强调了中国在中美联合作战中的特殊贡献与承受的代价。

袁著在结语部分对国民政府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对日防空得失作了全面的检讨。作者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国民政府对日防空抗战取得的成效，总结了三条值得反思的深刻教训：第一，国防工业落后、防空武器的对外依赖性太强；第二，防空建设在地域上不够平衡，缺乏向战略纵深发展的必要准备；第三，防空专门人才缺乏，各项消极防空举措落实不够到位。

袁著研究路径的新意在于其对国民政府防空体系的探究，这与既往的中日空战史大有不同，虽然作为积极防空来讲肯定会涉及空战经过，但袁著对于作战过程并没有过多的阐述，从而也避免了与以往战史研究的重复。

三、几点补充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是目前学界有关国民政府对日防空问题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专题研究，其研究的视角独特，内容丰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其启发，再略作以下几点补充认识。

国民政府对日防空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如把话题展开，实际可供研究的相关问题还有不少，此举三例。其一是蒋介石与战时的对日防空。袁著中虽也有所述，但有一问题笔者甚为关注，那就是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蒋介石，他何以对防空格外重视？据笔者所知，这实际上与蒋早年的一段军旅生涯很有关系。1916年蒋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留有《参谋长日记》。据该日记记载，8月4日“代理总司令派介石至西操场视操，飞行机试验活动”。^②8月7日又记载有“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飞高约800米突，飞行时间约有15分之久。第一师长

^① 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第57页。

^② 《蒋介石日记》（抄本），1916年8月4日，宁波市档案馆藏，下同。

亦入场参观”。^① 这表明蒋很早就对现代军事航空有所了解,这些经历无疑和蒋后来重视防空有密切关联。因此,如能结合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就蒋介石与对日防空作专门研究似很有学术意义。其二是战时各地方防空的多样性如能充分展开探讨,也必会有新的斩获。如在陕西,日军多次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军民根据延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建筑也开展了多种卓有成效的防空,但相关的系统研究目前还很少看到,似有必要专门探讨。其三是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问题。战时日军在中国多个省份实施了细菌战,其传播细菌最主要的方式便是空投,各地如何对此加以应对,也应当是防空的重要内容,值得专门研究。

此外,有关国民政府对日防空史料的利用仍有很大的扩充空间。袁著较为广泛地利用了中、英、日三种语言的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这在目前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已属难能可贵,但对现藏于美国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以及台北“国史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等处的国民政府空防档案尚利用得不够充分。从日文档案看,袁著已经大量使用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录的国立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研究所的未刊档案以及《战史丛书》等资料,但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关于中国航空作战的战报以及各级日军战场记录、回忆录甚至日文报刊等均可加以利用,史料的进一步扩充可极大地丰富国民政府对日防空问题的诸多细节。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防空问题是一个研究难度较大的课题,作者的研究是对抗战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蒋介石日记》(抄本),1916年8月7日。